中文版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保有版權的資料

我很高興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在這篇序言中，我想談談我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

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源於蘇聯在1945年的勝利，但我指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一場足球比賽。那一年，莫斯科迪納摩（Moscow Dynamo）足球俱樂部以4比3戰勝兵工廠（Arsenal）足球俱樂部。比賽開始時，每位蘇聯球員向對手送上一朵花，這在英國是一種聞所未聞的友好姿態，象徵了深厚的友誼與善意，英國觀眾為此熱烈歡呼。在比賽結束時，觀眾將獲勝的蘇聯球員簇擁著抬出球場。這看似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當時二戰剛剛結束，曾經並肩戰勝納粹的情誼餘溫尚在，西方的既得利益階層卻已經對蘇聯抱持懷疑態度。蘇聯的這場體育勝利促使我思考，如果蘇聯軍隊能擊敗德國，而莫斯科迪納摩又成為第一支在英國贏得比賽的外國足球隊，那麼社會主義一定有其可取之處。蘇聯球員的行為及觀眾的反應，再加上比賽結果，展現了社會主義如何進入公眾話題領域，並成為政治上可行、且令人嚮往的選擇。事實上，此後不久，蘇聯和中國都證明了在市場競爭和私有制之外存在另一條道路，即計劃性社會主義經濟。在戰後時期，許多社會主義措施也被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採用：對主要產業實行國有化，推行重大的再分配政策，建立福利國家。社會主義已經發展出了可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文化。

然而，21世紀初，政治和意識形態版圖發生了巨大變化。到2020年，西歐那些遵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藍圖的政府已無法立足，共產黨要麼解散，要麼退居政治邊緣，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在歐洲，社會主義集體生活的吸引力大幅消退。那些我在1957年世界青年節上遇到的充滿熱情的年輕共產主義者，已經變得心灰意冷。在後社會主義的歐洲國家，「同志們的世界」被消費主義的社會文化所取代，集體主義動機被佔有性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所取代，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被「工作福利國家」所取代。前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即便重新獲得政治權力，也未能扭轉局面，反而延續甚至推進了自由主義進程。中國則採用了私有制和市場競爭機制，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正式成員。

如今，輪到剩下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去適應新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與政策。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領導層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運動都歡迎這些政策。以蘇聯為首的改革派政府引入了市場化、公司制私有財產和市場競爭。瑪格麗特·戴卓爾曾宣稱，她最大的勝利就是將社會主義者（她指的是托尼·貝理雅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轉變為她的信徒。馬克思主義背景的批評者們，如大衛·哈維，則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新階段，是「恢復階級權力」的一種工具。

這些經歷促使我撰寫了這本書。為何在1960年代還毫不起眼的新自由主義運動，到了1980年代卻成為全世界經濟模式的權威？我目睹了蘇聯體系的瓦解，這對社會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折。我還可以將1974年我首次造訪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進行對比：彼時，道路上滿是泥濘與灰塵，交通工具主要依靠畜力；我如今所看到的則是巨型城市，擁有密集的高層住宅區、繁多的購物商場、世界級機場和米其林星級餐廳。本書概述了由共產主義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及戰後重建在初期取得的成功，以及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福利社會的興衰。書中還探討了為何20世紀前半葉發展起來的計劃經濟和福利國家後來都被市場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取代。無須否認，西方國內和跨國的政治、媒體及經濟精英們在推廣新自由主義政策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他們透過IMF的金融力量以及WTO的國際規則強加了這些政策。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不僅是西方主導和操控的結果，也是對國家主導型政策失敗的反應，以及後工業社會中社會結構重大變化的結果——我在書中對此有所論述。另外，新自由主義政策還被許多民選政府廣泛採納，作為應對經濟落後或衰退的解決方案。戴卓爾夫人的名言——除了新自由資本主義外，「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被廣為引用，已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本書的第1章中，我概述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批判陣營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哪些替代方案？幾乎沒有人認為傳統的社會主義範式——一個無階級社會，所有人按需分配——在西方國家當前的政治環境下是可行的目標。雖然這個範式在意識形態上令人嚮往，但從眼下現實到社會主義理想之間，尚無明確的路徑。

有人將中國視為通往這一目標的可能路徑，但本書的目標並非將中國等新興國家作為西方後工業社會邁向社會主義的範例。新興國家有其自身歷史，其社會和政治結構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不適合套用在擁有不同歷史、政治結構和經濟發展路徑的社會身上。我常被問到：「你如何評價我們國家的『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我的回答是，那些曾是「西方」附屬的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歷史、價值觀和目標做出自己的決定。

我在本書中的一個目標是勾勒那些20世紀曾存在過、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描述它們如何取得成功，以及為何又未能實現自身設定的目標。我們可以從他人的成功與錯誤中汲取經驗。我的目的在於探討富裕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被馬克思和列寧視為社會主義先鋒的西方社會——如何邁向社會主義。我總結了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徵、優勢與缺陷，以及為何在西方社會新自由主義應該被取代。我的論證基於以下邏輯：首先需要識別出新自由主義的優勢，為何它具有廣泛的吸引力，然後再探討其缺陷及可能的補救方案。最重要的是，我討論了是否存在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如何實現這一方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只有版權的資料

那麼，我們可以從以往建立社會主義的嘗試中學到些什麼？我試圖揭示後革命社會主義國家（post-revolutionary socialist countries）的發展成就：它們在工業化過程中有效地將前現代社會（pre-modern societies）轉變為現代國家，並且所帶來的混亂（例如失業、基礎服務匱乏）遠少於資本主義社會。蘇聯率先在不利的條件下推行了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但在其末期，計劃經濟機制已不足以應對後工業經濟的協調需要。如今，通訊與信息技術能有效處理現代經濟高度複雜的計算問題。然而，要讓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具有說服力並被接受，須提供比市場資本主義機制更好的東西：計劃體制必須避免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就像民主經過漫長的奮鬥成為西方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一樣，經濟民主也可以被引入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中。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應該比資本主義更具備內在的民主能力。然而，在過往的實踐中，那些社會主義體系卻未能如此，反而繼承了自身的帝國式等級結構和運行方式。

在當前民主選舉的政治條件下，引入社會主義需要廣泛的公眾支持。我們可以從20世紀俄羅斯和中國革命的消極結果中吸取教訓，並銘記這段歷史的陰暗面。在邁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至關重要的是防止內戰，避免經濟混亂，並努力提高人民的經濟福祉。20世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在內戰和民族戰爭中誕生的。政治壓迫和使用暴力不僅破壞了社會主義的形象，還會形成一種壓制性的政治文化，扭曲社會主義的性質。對於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挑戰在於在和平條件下設計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全面改善人們生活的方法。

我們需要對社會主義有一個定義：社會主義是一種以民主為原則組織起來、能夠響應人民需求的計劃經濟體系。社會主義不應僅作為一個長遠的政治目標被推廣，而必須讓人們看到在社會主義下生活更好——就像資本主義的生活比封建制度下的生活更好一樣。同時，重要的是不要威脅到那些通過自身積蓄和勞動積累個人財產的公民，並非所有事物都必須建立在國有和國家控制的基礎上，而應該更多地思考如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創新能力。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在最後一章，我討論了如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歐盟等）超越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我並不準備對發展中的新興國家提出建議，因為它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和政治發展路徑。我的目標在於促進政策制定，廢除勞動的階級剝削，提升人類福祉，並在過渡時期避免經濟混亂、防止政治破壞，最大限度減少社會衝突。我提出一種混合型的「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這可能對發達國家的公民有吸引力。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既提供了計劃經濟的優勢，又保留了市場經濟中的消費者選擇權和個人創業精神。我提出的是一種「計劃與市場調節的結合體」。這並非一個烏托邦，而是比當前的新自由主義更好的選擇。

我必須感謝許多人，他們幫助我出版這本書，並對其中多處內容提供了改進意見。我特別要感謝俄羅斯自由經濟學會會長謝爾蓋·博德魯諾夫，感謝他邀請我參加他組織的多場學術會議；我還要感謝已故的亞歷山大·布茲加林，他曾在他主辦的期刊中刊登過我的數篇作品。在中國，我要感謝北京大學，並感謝以下幾位教授讓我有機會在他們的學校講學：山東大學的朱貴昌教授，清華大學的龍登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韓強教授，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王義桅教授。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謝姜宏博士持續且熱情的支持，感謝他與李嘉哲共同付出的努力，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

大衛·萊恩

2024年11月24日

於英國劍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推薦序一

實現政治上的不可能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2003–2004年，我在劍橋大學國際研究中心訪學期間與萊恩教授相識（他在社會學系而不是國際研究中心工作），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與聯繫，萊恩教授每次有新的論文著作發表都會第一時間與我分享，同時我也多次邀請他來山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對於教授出版的最新學術著作《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及其替代》可以說是先睹為快，教授2023年5月來北京大學交流時就給我介紹過其書稿，2024年5月來山東大學交流時把正式出版的英文書贈送給我。如今中文譯本即將付梓，我對此表示祝賀，同時也談談自己拜讀教授大作後的一點感想。

自從新自由主義在1980年代隨著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總統列根的極力推進，而在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興起後，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金融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在世界範圍內興起，成為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和一股強大的國際力量，甚至成為制定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常識」，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就是把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奉為行動的圭臬。然而，21世紀初、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帶來的全球性經濟衰退以來，新自由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形態正受到廣泛質疑，新自由主義「不可替代」的神話和「別無選擇」的話語敘事已經不攻自滅。面對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七個重大且日益嚴峻的結構性問題，人類迫切需要尋求新自由主義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萊恩教授這本專著無疑就是這方面的最新探索和嘗試。

萊恩教授長期關注世界社會主義、尤其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的轉型研究，其學術旨趣和關懷始終是如何改造和超越現代資本主義，實現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轉型和替代，從而促進人類進步，這本專著正是他長期對這個問題思考的結果。本書不僅概述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解釋了新自由資本主義興起的背後動因，指出了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徵、優勢與缺陷，而且還總結了20世紀歐洲引入社會主義（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和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剖析了對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各種批判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諸種替代方案，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萊恩教授自己所偏好的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m）替代方案。

基於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長期的學術積澱，萊恩教授在書中不僅為我們深入理解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提供了社會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和國際關係的深刻見解，而且還為我們實踐探索新自由主義的可行的替代方案提供了新的目標願景和路徑選擇。對於任何想要深入理解我們當下所處的世界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的讀者而言，本書都具有極高的閱讀價值和啟示意義。

萊恩教授這本專著最鮮明的特點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正如其在導論中所言，將階級重新置於現代資本主義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如在分析新自由主義興起的背後動因時，他深有洞見地指出，隨著後工業化的發展而不斷壯大的非體力專業階級（professional class）或服務階級（service class）是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興起的社會和政治基礎，而這個階級的不斷壯大與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的衰退，則成為蘇聯社會主義和英國社會民主主義衰落的根源。

與社會主義的興衰不同，新自由資本主義儘管經歷了許多危機，公眾和學術界也從未停止對其批評，但新自由主義仍然在21世紀初存續了下來，有缺點但仍然不可撼動，何以如此？萊恩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造就了一個全球資產階級（global capitalist class）或者說是全球政治階級（global political class）（萊恩教授把政界、學界、媒體等精英以及國際組織的高管也納入其中，認為他們與全球資產階級一樣是全球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政治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正是這些精英群體達成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共識，正是這全球政治階級維繫並擴展著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體系。

因此，要想超越或者替代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任何拋棄階級政治的做法都是幼稚的，甚至是有害的。萊恩教授尖銳地指出了貝理雅和白高敦領導下的英國工黨拋棄階級政治、轉而採用身份政治的意識形態框架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使得他們所踐行的所謂「第三條道路」不僅未能提供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反而異化成了一種左翼新自由主義，最終以失敗告終，並使新左派長期陷入階級身份危機之中，被拋棄的底層工人階級轉向右翼民粹主義，進而助推了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但是正如萊恩教授所指出的那樣，民粹主義運動所反對的是全球化而不是資本主義，它們試圖重新建立對國家邊界的政治和經濟控制，使全球化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國際化資本主義。同樣，針對佔領華爾街的反全球化運動以及「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等身份政治運動，在肯定這些自發運動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他也坦承這些運動因缺乏明確的階級意識和階級動員，難以挑戰資本主義及其新自由主義形式，也無法帶來實質的重大政治經濟變革。

哪個階級有望承擔起推動歷史變革的重任呢？有學者認為，隨著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逐漸從依賴物質投入和體力勞動轉向基於人類智慧、知識和創新為主的後資本主義模式，在這種後資本主義模式（或者說數字資本主義模式）下，一個由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知識專業型人士組成的新興階級（new ascending class）亦即創新階級（creatariat / creative class）正在形成，這個創新階級更偏好協作生產而非彼此競爭，有望成為政治變革的推動者和動力。萊恩教授在書中對這些觀點進行了評析，認為雖然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催生出新興階級，但是這些力量目前仍然處於萌芽狀態，其未來發展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那麼，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能夠超越和取代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嗎？相信讀者閱讀完萊恩教授的這本專著後，就會有明確的答案。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不僅應該、而且能夠被超越和取代，問題的關鍵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貝利服務的優秀

是如何實現這種變革，採取哪些政策來「實現政治上的不可能」。期待各位讀者能夠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貢獻自己的智慧力量，把政治上的不可能變為政治上的必然。

朱貴昌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推薦序二

將階級重新置於資本主義分析的核心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2008年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決策者關於經濟增長良好和金融穩定的「大緩和」判斷被打破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基於主流貨幣理論的宏觀經濟政策，因金融資本的垮台和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元氣大傷。2020年新冠疫情危機進一步戳破了新自由主義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領域的神話，長期的私有化改革，財政緊縮對公共醫療體系和社會安全網造成的脆弱性，暴露無遺。近年來以人工智慧和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技術的發展不僅未能像凱恩斯預測的那樣，進一步縮短工作時間、為休閒和家庭生活提供更多機會，經由演算法管理和「永遠線上」文化反而提高了有償工作時間的勞動強度，增加了無償工作時間，延長了工作日。面對新自由主義削減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導致工作不穩定、工資停滯和經濟不平等問題，工人和年輕人都在質疑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尋求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替代方案。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大衛·萊恩最新專著的中文譯本《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及其替代》適時出版。本書討論了歷史、現實和理論中存在的六種替代方案，包括國家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國有資本主義、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和自給自足自治的網路型社區模式，並提出了他個人傾向的一種首選方案——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為當前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探討和尋求替代方案的實踐探索提供了新思想、新視角。

從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走向全球新自由主義

二戰後，以蘇聯體制為典型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積極實施了由國家主導的全面工業化進程。同一時期，以英國工黨政府為代表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國有企業、高累進稅和福利國家等舉措，有力地對抗了資本主義所導致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兩種體制在戰後初期都成功引領了經濟復甦，贏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失敗和政治挑戰接踵而至，在西方各路國內和跨國精英的推波助瀾下，它們幾乎都同步轉向了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金融化為特徵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最終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範圍內的階級力量對比。

對於蘇聯體制為何走向解體、發達國家黃金年代為何走向終結的問題，有很多學者分別進行了深入研究。如大衛·科茲（David Kotz）在《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強調，在蘇聯體制中佔統治地位的黨國精英主導了蘇聯體制的崩潰；諸多政治經濟學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利潤率下降理論（利潤擠壓理論、經濟剩餘吸收困難理論和國際資本競爭理論等），以解釋二戰後發達國家長波上行期的結束。

萊恩在書中從獨特的階級結構變遷視角，對上述兩個問題提供了別具一格的答案。他通過詳實的資料表明，不論是蘇聯還是英國，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其階級結構都出現了顯著分化：受過教育、具備專業資質且從事服務業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從事製造業的體力勞動工人階級則逐漸萎縮。他認為這種階級的解體是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一分析方法不禁讓人聯想到迪梅尼爾（Gérard Duménil）和萊維（Dominique Lévy）的《大分化：正在走向終結的新自由主義》，他們的階級結構分析強調的並非階級的解體，而是階級的重組。他們認為二戰之後的社會民主主義依賴於大眾階級和管理者階級之間的左翼聯盟，美國和歐洲之後向右轉向新自由主義道路的背後，是資本家階級與管理者階級在社會層面、尤其是政治層面的聯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真有閱讀必須

資本主義階段性的階級結構變遷，在歷史上可能存在著階級解體和階級重組的交織並存，但不管哪一形式佔據主導地位，這種分析方法都提醒我們要足以重視中產階級或管理者階級（或者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更常用的小資產階級）在左翼運動右轉和革命失敗中的關鍵作用。

中國模式：具有社會主義特徵的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

在西方學界，對於中國模式的評價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較為負面，對內片面強調中國政治制度的威權主義特徵，對外大肆散播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威脅論；另一種觀點則相對正面，對內肯定中國經濟增長體制對新自由主義規範的抵抗，對外認可中國在對抗美國霸權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作用。

萊恩的研究區分了三種國家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社會主義、國有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官方自稱為社會主義而產生的，與國家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發揮經濟協調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概念有所不同）和以中國模式為代表的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這三種制度的區別在於：在國家社會主義中，國家擁有經濟資產，直接佔有並分配經濟剩餘；在國有資本主義中，官僚階級佔有一大部分經濟剩餘；在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中，私有企業獲得和分配經濟剩餘。萊恩將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概念追溯至列寧在蘇聯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意指社會主義國家對國內營運的逐利型私人企業進行控制。儘管對於「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這一概念是否能夠恰當地描述中國模式仍存在爭議，有待進一步探討，但萊恩對中國模式的整體評價屬於上文中劃分的第二種積極評價。他認為雖然中國的社會形態具有過渡性，但中國制度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而且中國在以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充當著重要的制衡力量。

在西方左翼的概念界定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究竟更趨近於國家控制型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市場社會主義，依然存

香港中文大學中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在爭論。儘管如此，萊恩對中國模式的重視，以及對國家作用的強調，都表明他已洞察到打開國家理論的黑箱、揭示國家在經濟治理進程中的作用，是理解中國市場經濟制度乃至現代市場經濟的關節所在。進一步從方法論角度而言，這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啟示：國家不僅僅作為政治制度或上層建築而存在，它更是經濟制度或經濟基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剩餘價值的生產、佔有、分配和使用等一系列環節中，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內生性作用。

經由階級分析走向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

萊恩在導論中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將階級重新置於資本主義分析的核心」。這一分析方法猶如穿透重重迷霧的陽光，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洞察各種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背後的本質。

自戴卓爾夫人主導了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貝理雅領導下的工黨為了取得選舉的勝利，放棄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轉而走向了偽裝為第三條道路的左翼新自由主義，將社會階級分析降格為身份政治。萊恩對這種身份政治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他指出這種政治運動缺乏對共同的經濟地位和階級地位的認同，實際上掩蓋了階級問題和經濟剝削問題。即使身份群體所面臨的社會歧視被消除了，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剝削依然無法根除。階級與社會主義政治的脫鈎，導致了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謂的「婆羅門左派」的興起，使得發達國家左翼政黨的票倉逐漸轉變為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階級選民。這也正是被拋棄的底層工人階級轉向右翼民粹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基礎。以「佔領華爾街」為代表的各種佔領運動意味著反對資本主義運動的重點開始發生轉變，從關注身份認同轉向更多與社會階級相關的問題，比如金融利益集團的統治和金錢選舉等。但這些運動缺乏明確的階級動員，沒有構成社會主義政黨的集體政治，因此只能淪為暫時的情感宣洩，無法帶來實質的重大政治經濟變革。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在本書結尾處，萊恩提出了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這一方案整體上可以看作是21世紀版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試圖通過選舉政治在發達國家引入一系列改良措施，包括逐漸擴大國有制、從股東利益最大化轉變為考慮相關利益者的企業治理制度、提供就業保障和公共福利等。與西方左翼學者往往強調參與式民主或者某種形式的自治主義不同，萊恩指出，在數位通訊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宏觀層面的國家計劃或者國家規劃對於調節經濟剩餘水準、平衡當前和未來之間的需求分配、實施環境友好型政策、縮短工作日等目標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當然，關於實現這一願景的階級主體和因果機制，是萊恩這本書遺留下來的重要課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索。

總體而言，這本書不僅為我們深入理解從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到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演變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也為我們探索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素材和深刻的思考方向。相信無論是對相關領域的學者、研究者，還是對關注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普通讀者來說，都具有極高的閱讀價值和啟示意義。如果你對社會階級結構的變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感興趣，那麼這本書不容錯過。同時，我也期待你在閱讀過程中，能對書中提出的觀點和問題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為經由階級分析走向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持續提供理論上的思考和實踐上的探索。

孫小雨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保留版權所有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推薦序三

當代經濟改革的需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維特（Witte）新工業發展研究院再次向讀者推介大衛·萊恩的著作。在2022年，我們就已經翻譯出版了萊恩的專著*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ocialism: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State Socialist Society, and What Followed*。維特新工業發展研究院與萊恩的合作由來已久，我們在英國劍橋共同舉辦過學術研討會，萊恩也曾多次參加本研究院在歐洲和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萊恩還是聖彼得堡國際經濟大會（SPEC）和莫斯科學術經濟論壇（MAEF）的積極參與者。

在萊恩的這本新書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他在分析新自由資本主義及其替代方案時運用的方法相當卓越。與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批評者和支持者不同，萊恩並不僅僅局限於探討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優缺點，而是首先探究導致該模式形成的原因。因此，萊恩在分析新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時，並未直接從該模式本身出發，而是從研究新自由主義模式出現之前的那些經濟體系開始。他關注蘇聯及其追隨者建立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他關注社會民主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在西歐最為典型，但其特徵也存在於其他發達國家，包括美國。

國家社會主義模式曾是與資本主義體系決裂最為徹底的例子。然而，儘管該模式在建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成功，但它未能成功應對自身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多挑戰，特別是在面對新一輪科技進步時無法實現順利轉型。最終，該模式出現經濟發展停滯，引起民眾的失望。

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則試圖改革資本主義，使其變得更加公平並具有社會性導向。然而，到1970年代，它的潛力也已耗盡。雖然該模式曾促成經濟高速增長並減緩社會不平等，但其內部矛盾已經張力十足，運用的經濟手段與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產生了衝突。通過政府預算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達到了極限，為了緩解社會問題而提高稅收的政策也抑制了企業的投資活動。

對於這些問題的回應便是新自由主義。幾乎是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各國都轉向了新自由主義，採納政府干預最小化的意識形態，之前加諸企業的許多限制被取消，但是，這一轉向絕不意味著完全取消政府對經濟的監管。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曾將這種經濟政策稱為「雜牌凱恩斯主義」（bastard Keynesianism）。[1]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提倡的極端自由化政策，主要是為了「出口推銷」，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以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那些國家。對於這些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的負面影響迅速出現，也表現得尤其劇烈。而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最初確實帶來了某種程度的經濟復甦，並推動了所謂的「信息革命」，即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

本書清楚地展示出，新自由主義模式能夠促進西方國家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全球化與金融化。全球化使跨國資本能夠利用發展中國家相對廉價的資源，並加深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世界經濟發展。金融化則開闢了新的投資機會。然而，副作用很快顯現：全球化加劇了國際競爭，在新興工業國崛起的同時，發達國家的工業潛力相對下降，並加深了最貧困國家的落後程度；金融化則使投資活動封閉於金融資產領域，這些資產變得越來越複雜而且風險不斷上升，最終導致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社會不平等變得愈發刺眼，這也加劇了發達國家的社會不穩定。儘管「綠色議程」廣受關注，但全球化無助於解決環境問題，反而加劇了環境危機。最終，新自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1　這位經濟學家是海曼 · 明斯基（Hyman Minsky）。——譯者註

由主義模式正面臨經濟停滯、金融不穩定，以及來自大型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BRICS]）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政策的抵制。

在這種情況下，尋找新自由主義替代方案的問題順理成章，萊恩的思想也就尤為重要。他的替代方案不是憑空構想，而是基於新自由主義自身的教訓，並借鑒了過去建立過的那些非自由經濟模式的嘗試。萊恩認為，可能的替代模式有四種：

第一種是國家資本主義，以國家作為私人和公有企業運作的主要監管者。

第二種也是國家資本主義，[2] 但不同於第一種，國家在此模式中是主要的經濟資產所有者。

第三種是國家社會主義，但萊恩認為，考慮到過去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存在的問題，它可以是一種受到國家調控的市場社會主義，以此避免過度官僚化的弊病。

第四種則是一種由自主管理的經濟聯合體組成的模式，儘管其實現的可能性最小，但作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理論性（絕非烏托邦式）替代方案，仍可加以考慮，因為該模式的某些特徵在現實經濟中已有所體現。

從萊恩的觀點來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選擇，不僅因為它強調政府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還因為它能夠維護民族國家的利益，而不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那樣掩蓋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主導世界經濟的企圖。萊恩認為，通過轉向政府調控的市場社會主義，可以更為徹底地擺脫新自由主義模式。這種混合模式能夠在盡可能不引發劇烈衝突的情況下，順利過渡到新型經濟體系，同時保留市場競爭與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用以有效協調生產與消費。此外，這一模式有助於逐步擺脫「消費社會」的傳統，減少經濟上的自我中心主義。在中國的當代經濟模式中可以看到此模式的某些特徵，儘管

2　本書譯為「國有資本主義」。——譯者註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萊恩本人對當代中國頗吝詞句，只將當前中國體系定義為「帶有社會主義特徵的國家調控型資本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萊恩認為，新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危機根源在於其自身孕育的技術變革，這與維特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兩相契合，為雙方的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本書揭示，現代技術變革正在改變勞動結構和社會職業構成，雖然未來的變化仍存在不確定性，但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發展無疑將削減例行性（泰勒化）的工作崗位，並擴大創新性崗位數量。這些變化的具體影響仍有待觀察。

毫無疑問，大衛·萊恩的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理解新自由資本主義及其潛在替代方案的機會。變革的需求已經成熟，而本書正是我們在邁向共同未來的道路上，理解潛在選擇的重要一步。

謝爾蓋·博德魯諾夫（Sergey Dmitrievich Bodrunov）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
俄羅斯自由經濟學會會長
維特新工業發展研究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譯者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只有版權的資料

我曾經以為，在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把一本英文書翻譯為中文書會是相當簡單的一件事，但在翻譯過程中，我發現要做到「信、達、雅」的要求依然頗費一番腦力。尤其是要精準而清晰地表達出作者的原意，直譯是遠遠不夠的。雖說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量的語種在消失，但幾種強勢語言顯然仍在不斷擴張——一個只說一種語言的世界遙遙無期，也不可取。有著語言多樣性的世界應是很美。因此，翻譯在短期內仍為思想傳播所必需，人工翻譯也就更為精品翻譯所必需。借用本書的話，致力於改變社會的思想應該跨越語言的藩籬，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變成政治上的必然」。

本書的論述對象是一種最新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特徵就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一方面，不同於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研究的古典式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賦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些新的特徵，作者在第2章已經重點分析過這個最新版本的資本主義。對此，他是抱持批判態度的。另一方面，這種資本主義實現了全球化，在此過程中重塑了世界階級結構和國家間的互動方式，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具有了新的特徵。對此，本書作者並不持全面的批判態度，而是建議對全球化過程做出一些修改、調整，將弱化國家主權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轉變為強調國家主權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

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崛起，伴隨著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和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急劇衰退，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前者是後者的原因。本書作者將依靠革命取得政權的東歐共產主義政黨和依靠選舉進入政府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視為「社會主義」的後裔——這一點或許並不符合中國讀者的傳統認知。作者選擇了英國的工黨作為西歐社民主義政黨的代表進行分析，但我想請感興趣的讀者將目光沿著時間和空間維度進行擴展。在19世紀下半葉，英國工人階級在擴大普選權方面取得巨大進步，這為工人階級議會政黨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德國為了消弭工人階級運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福利體系——逐步覆蓋醫療、養老和就業。弔詭的是，英國和德國推動此類改革的頭面人物分別是保守派的迪斯雷利首相和俾斯麥總理。時代條件的變化給工人階級提出了新問題。社會民主主義在19世紀末期漸成工人運動的主要潮流，也得到恩格斯本人的大力支持，某種程度上也曾得到馬克思本人的贊成（遺憾的是，馬克思在1883年去世）。在德國，伯恩斯坦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旗手，德國社民黨也成為那個時期西歐最為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在20世紀初，德國社民黨不斷壯大，在一戰結束後社民黨領導人艾伯特成為威瑪共和國的首任總統。在英國，擊敗納粹德國兩個月後，工黨就在選舉中取得驚人勝利，工黨領導人艾德禮戰勝戰時統帥邱吉爾。二戰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建立起福利型社會民主主義。

因此，對西方很多國家的思想家而言，社會主義一詞覆蓋的政治光譜還包括發達國家的社民主義——或許，這是更強大的社會主義後代。馬克思曾立場堅定地說過，自己描繪的社會主義應該首先出現在英美等發達工業國家：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非常成熟後並產生了新的成分之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才出現不適應，才會出現向新的生產方式前進的動力。這既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而且，這不僅符合理論，於實踐也更為有利：社會主義應該建立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而發達工業國家已經建立起這個基礎。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就是資本不斷集中，資本越是集中在少數幾個資本家手中，就越是為經濟的計劃性準備條件，就越是為工人階級接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貝塔版權所有

資本主義企業準備條件。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作者是一位古典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拒絕對欠發達國家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多置評，這更是一種古典馬克思主義表態。也正是在此基礎上，萊恩教授提出了調節型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發達國家通往社會主義的可行之途。

有關翻譯的一些術語我要加以說明。比如，英文的legitimacy目前普遍譯為「合法性」，但我一貫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準確的譯法。關於legitimacy和政治支配的一系列理論來源於馬克斯·韋伯，韋伯首要使用的是*Herrschaft*這個德語詞，而這個詞在英文中就有至少三種譯法：rulership、authority、domination。韋伯研究的權威專家施魯赫特教授認可domination這種譯法，這個英文詞語能更好地反映一種更普遍的支配－被支配關係。出於同樣的原因，我選擇將legitimacy/*Legitimität*及相關概念一律譯為「正當性」而不是「合法性」。

翻譯這本書是一趟快樂的旅程，我將過去學到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知識運用到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不揣冒昧，我想夾帶一點「私貨」，在此感謝對我至關重要的三位導師：劍橋大學萊恩教授、法蘭克福大學謝弗德教授和海德堡大學施魯赫特教授。他們以精深的知識和堪稱藝術的學術風格將我引領至社會科學萬神殿，那裏有馬克思和韋伯，有西方思想史上燦若群星的思想家們。但丁在《神曲》中有一句詩：「我已用智慧和藝術將你引領至此，接下來就讓興趣做你的領路人吧。」謝弗德教授曾經告訴我，能在年輕的時候就找到可以持續一生的東西是一種幸運。而我很幸運，在尚年輕的時候就找到了一個可以持續一生的東西。歌德曾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有人漏夜下西洋，有人風雪歸故鄉，我們所求的無非是一段無悔且滾燙的旅程！

姜宏

2025年1月17日

於美茵河畔法蘭克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